

商務印書館

# 家永三郎自傳

石曉軍 劉燕 田原 譯

因文部省審定教科書案廣為人知的家永三郎，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者的識見，  
細審自己一生所見證的日本近代波瀾和社會面目。

# 家永三郎自傳

一個歷史學家的足跡

家永三郎 著



商務印書館

# 家永三郎自傳

一個歷史學家的足跡

家永三郎 著

家永三郎自傳——

一個歷史學家的足跡

作者： 家永三郎

譯者： 石曉軍 劉燕 田原

責任編輯：胡務 陳玉輝

設計： 陳穎欣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濠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茶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室

版次： 200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303 8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方，以中文或任何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本書中文版（包括繁體字及簡體字）獲日本三省堂株式會社授權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

這本小書是應與我有多年合作關係的三省堂之約而寫的。三省堂準備推出一套有特色的叢書，約我無論如何也要寫其中一本。起初，我堅決地推辭掉了，但後來經不住出版社編輯的再三勸說，最終還是應承了下來，寫成了這部小冊子。

我的本職工作是從事研究和教學，在完成本職工作之外，又提出了有關教科書審定的訴訟，這件訴訟案自然佔去了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我來說，再要擠出時間執筆寫一本新書，幾乎沒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議，可否以“教科書訴訟”發生以前我所走過的道路為題目，圍繞這個話題隨便談，然後再將我的談話記錄整理成書，這或許是個可行的辦法。我也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便分數次口述了我這50年來的心路歷程，並請人將我的口述速記了下來。

可是速記記錄整理出來後，我發現其中很多地方都不像文章的體裁，必須全面改寫或增刪，結果所花的時間幾乎與重寫一遍一樣。

現在，當我重讀這本書的校樣時，的確感到很躊躇。像我這樣的人的自傳值得出版麼？事到如今，似乎已沒有打退堂鼓的餘地了。加之又一想，我的經歷和體驗儘管很膚淺，畢竟也還是一種個人經歷的歷史事實，這對於想了解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的人來說，或許有一些參考價值。尤其到了今天，開始活躍於社會各個領域的人，大都對戰前日本毫不知情，因而戰前一代人的經歷記錄，在形象具體地再現戰前日本的氣氛方面，也許

對年輕人不無助益。考慮到這一點，雖然有些不自量，我還是決定冒昧地把這本書公之於世。

考慮到保護第三者個人隱私的問題，加之篇幅限制，不少事情我本來覺得應該寫出來，卻又不得不忍痛割愛，尤其是一些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事，如與許多優秀前輩、學友之間的關係等，在本書中幾乎都未能涉及到，這的確令人遺憾。儘管如此，能有機會就自己走過的路進行回憶，並以現在這樣的形式粗線條地勾畫出來，以對自己的前半生加以清算，這完全是三省堂出版部諸位先生努力的結果，是他們給了我這一機會。以上就是本書寫作的緣起和大概經過，謹以此代跋。

1967 年盛夏

本書的初版作為“三省堂新書”之一公開問世，是1967年9月的事。正如初版的副標題《到教科書審判為止》所表明的那樣，初版的主題主要在於回顧教科書訴訟發生之前，我作為一名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所走過的道路。

這次，三省堂又將推出新的“三省堂選書”，為此出版部的編輯希望我在拙著中增補上初版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再次作為“選書”之一種出版。自10年前“新書”版公刊後，教科書審判已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發展成為了社會性的大事件。迄今為止，訴訟已持續了12年，規模越來越大，至今仍在繼續，我感到有必要把截至目前為止的訴訟經過寫出來，以提供給新的讀者。

另外，在我所奉職的東京教育大學，圍繞遷校的風波，從上述“新書”版出版時就已濫觴，其後則愈演愈烈，在全國其他各大學的“紛爭”中也屬十分罕見。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院教授會在這場鬥爭中，一貫堅持反對遷校的主張，我作為該教授會的一員，也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這段經歷也是我整個生涯中最苛烈的體驗之一。正如我在書中已寫到的那樣，這場鬥爭的結局是以撤消東京教育大學，建立筑波大學而告終。與文學院實質上的壽終正寢同時，我也迎來了退休之日。在我的一生中，此事是可與教科書訴訟相提並論的重要經歷，因而我覺得有必要將其增補進去。

於是，我便在“新書”版的第九章之後，又增加了第十章，就上述兩個重大事件進行了簡單的描述，同時

敘述了我當時的心境等內容，現作為“選書”之一，重新呈獻給諸位讀者。

我一生的大半都獻給了東京教育大學，現在正值退休這一人生的轉折點上，對過去加以總結，顯然是有必要的。這次出版增補版，或許並非完全沒有意義，這也正是我同意刊行增補版的主要原因，我的這本小書也就只寫到東京教育大學的解散及我的退休為止。

就此擱筆，是為序。

1977年6月



在過去長達2000年的歲月中，日本一直不斷地攝取、學習直接從中國本土或經由朝鮮半島傳來的中國文化。直到19世紀左右為止，中國始終比日本先進，走在日本的前面。從19世紀中葉開始，日本為輸入和吸收西洋文明而不遺餘力，中國則開始向日本派出留學生。

雖然日本始終熱心模仿、學習外國文化，但是經日本孕育、產生出來的文化，無論是與中國還是與西洋都明顯不同——具有濃厚的日本色彩。關於其具體內容可參閱1992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拙著《日本文化史》一書。

我出生於20世紀初葉，成長於“大日本帝國”對外侵佔臺灣、朝鮮、樺太<sup>1</sup>等地區，對內嚴厲限制本國人民權利的時代。儘管如此，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幼年時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得以在比較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然而不幸的是，作為一名研究者，我的學術研究生涯卻不得不始於1931年爆發的侵華戰爭時期。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和平得以恢復，其後社會仍繼續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況之中。戰爭末期及戰後初期，人們飢寒交迫、精神頹廢。今天，僅從外觀上看，人們大幅度地獲得了精神自由。在衣食住行方面，也享受着戰前根本無法相比的高水準生活。但是，若從“教科書審定”一事來看，我們難道從中不能覺察到自由並沒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嗎？我每每懊悔，以個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這場不義莽撞的戰爭，也未能促使戰爭盡早結束，可以說，我對這場戰爭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為基本陣地，通過廣泛地評論社會問題，來闡述和宣傳自己的信念。

鑑於日本年輕一代不了解近80年來日本動蕩險峻的社會現實，我遂於數年前撰寫了此書，沒想到竟會有機會被譯為中文。我生來是蒲柳之質，諸病纏身，為宿疾所苦；加之險惡的社會環境，我的一生充滿了荊棘坎坷，毫無值得炫耀之處。我想，中國的年輕一代大約與日本的年輕人同樣，對我的生涯及其時代知之甚少吧。若蒙讀者不棄，賜讀拙著，則不勝榮幸。最後，謹對翻譯本書的石曉軍先生、劉燕小姐及田原先生表示衷心感謝。

家永三郎

1999年3月

譯註

- 1 樺太：是日本對庫頁島（薩哈林島）的舊稱（kuril Island：KypHjib-ckHe OcTpoBa），位於日本宗谷海峽與北海道以北，西伯利亞及韃靼海峽以東。安政二年（1855）《日俄和親條約》規定由日俄雙方管理。明治八年（1875）日俄簽訂《千島及庫頁島互換條約》，千島群島歸日本，庫頁島歸俄國領有。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取得了庫頁島南部的領有權，其後逐步向北部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完全控制了該島。1945年，前蘇聯對日宣戰後，佔領該島。爾後根據1951年《舊金山媾和條約》第二條，將庫頁島全部並入前蘇聯版圖。

# 目 錄

1967年初版後記 .....	vi
1977年增補版前言 .....	viii
中文版序言——致中國讀者 .....	x
第一章 我的家庭和幼年時代 .....	1
第二章 我與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教育 .....	13
第三章 對於歷史的憧憬——中學時代的回憶 .....	25
第四章 思想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	45
第五章 學生運動被鎮壓後的大學生活 .....	55
第六章 始於“黑暗谷底時代”的研究生涯 .....	71
第七章 戰爭結束時的心境 .....	93
第八章 反動逆流的出現與我的社會認識的成長 .....	103
第九章 “教科書訴訟”的背景 .....	121
第十章 “教科書訴訟”與在東京教育大學的鬥爭 .....	147

## 附 錄

一、家永三郎大事年表(譯者編譯) .....	167
二、“家永教科書訴訟”小史(日本聲援“教科書審定訴訟”全國聯誼會) .....	179
三、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一位史學家的研究與實踐(代譯後記 石曉軍) .....	231

我的家庭

和幼年

時代

幼

年

時

代

## ◎ 幼年的回憶 ◎

我開始記事大概是在大正五、六年(1916、1917)前後。大阪市東區玉造的家給我留下了最古老的記憶。那時我的父親擔任大阪步兵第三十七連隊的連隊長。之前好像在玉造之外的地方也居住過，但我已記不清楚，童年的記憶是從玉造的生活開始的。

記得我家的附近有一座祭祀五穀神的“三光神社”。神殿坐落在高台之上，石階的旁邊有池塘，魚兒在池塘游來游去的姿影至今我還記憶猶新。數年前相隔40年重訪玉造，流連於三光神社時，儘管神殿已因兵燹焚毀，但是留在我記憶裏的石階和神社門前的兩尊石獅子等都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下來，真的很令人懷念。

雖然記不清楚房屋周圍的地理環境，可是屋內的空間和擺設，甚至連屋子的外觀設計至今仍歷歷在目，也許是年幼時我很少到外面遊玩，整天把自己關閉在家的緣故。那個家是將一幢有5個單元的大屋靠頭的兩單元打通，作為一個家租賃下的，雖然有很多個房間，但是沒有像樣的院子，緊挨着居室擋着一堵高高的土牆，沒有陽光，在這樣的家中總是不常外出遊玩，無疑不利於我的健康。

在這個家中，母親好像心臟不好，有一段日子總是臥床不起。之後轉到和泉的貝冢，療養了三個月左右，患病的母親不得已把我也帶到貝冢。那個地方的環境仍然不利於我的健康。

5歲或6歲的時候，我患過耳鳴，還記得我去看病的情景。從那時候起我的健康便像被病魔侵蝕過似的，每況愈下。

在此稍稍再追溯一下我記事之前的事情，儘管都是後來聽說的。我好像是大正二年(1913)9月3日出生在名古屋市東區的一條叫做白壁町的街道。當時，父親是陸軍的步兵中校，在名古屋的連隊裏任職，可是在我即將降生之際，父親轉任熊本八代連隊區司令

官，我是在父親隻身到九州赴任之後出生的。因為三個月後我們就舉家遷到父親的任職地八代，我對名古屋自然不會有任何記憶。

在八代生活期間，當時讀小學的姐姐住進了福岡九州帝國大學的附屬醫院，為此母親偕着還是襁褓中的我，為了護理患病的姐姐，母子3人在九州帝大的附屬醫院裏住了很長時間。

為了積攢住院費，陪護的母親不得不縮減自己的食物，在那樣的生活給我的母乳是否含有足夠的營養可想而知。我自幼就體弱多病，可以說這樣的童年時代的環境也是原因之一。

### ㊦ 繁榮時代裏窘迫的家庭經濟 ㊦

談起窘迫，讀者可能會問軍人家庭為甚麼沒有很好的經濟來源。對於只了解太平洋戰爭時代的軍人應是有權勢的人來說，或許認為所有軍人都生活奢侈。我不知道與軍部有密切往來的軍人的情況是怎樣的，但是，在我父親的時代，就一般的軍人而言，其待遇與全盛時代的軍人無法相比。

在我剛剛懂事的大正五、六年(1916、1917)，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是百廢待舉的好時期。儘管物價一個勁地上漲，通貨膨脹，但薪水卻沒有跟着增加，因而家庭生活窮困潦倒到了極點。

當時連隊長的軍餉一個月僅僅二百幾十元，扣除各種各樣的費用後，能帶回家裏的可以說不足二百元。加之父親還不得不為自己的弟弟、即我的叔父等人交納學費，那時候生活的窮愁情景，母親後來常常追述起。當時的武官好像是沒有年度獎金，而且隊長的崗位津貼才20元。

聯隊的將校經常正月在一起大會餐，他們在二樓舉杯暢飲，熱

鬧非凡的情景如今記憶猶新。因為父親一點兒也不能飲酒，在將校們的杯酒言歡聲中，父親早已酩酊大醉，睡躺在一樓的房間裏。

乍一看，這種軍人生活似乎是吃喝不愁，但實際上對於家庭卻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負擔。

因為我的父親極不善於與人交際，又不能飲酒，顯然難以晉升，而且性格死板倔強，總是常常向長官率直進言。父親陸軍大學畢業後，儘管是走出大學校門的高材生，卻沒有授予很好的官職。作為大阪的連隊長，終於在大正八年（1919）晉升為少將，但晉升的同時被規勸退職待命，接着便被編入預備隊伍。

如前所述，因八代時期花去了很多住院費用，幾乎將少校、中校時代的一點積蓄耗用殆盡。好景氣時代的低薪，加上作為連隊長還要花去必要體面的交際費，可以說生活艱苦到了絕頂，還有突然的被撤職，對於父親的打擊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從父親被編入預備隊伍，微薄的養老金撫養4個孩子，尤其是不得不供上面的兩個哥哥繼續升學讀書，當時的家庭經濟真是艱難竭蹶。

## ≡ 清貧中的自豪 ≡

作為軍人的孩子，我從小學起卻只能在捉襟見肘、極度窘迫的經濟條件下成長。我的母親為了我們的健康，自己從沒吃過雞蛋，但是每天早晨一定讓我吃到雞蛋。儘管談不上十分拮据，但我卻切身體會到了家庭的清貧。

小學時代，我有時讓父母購買《少年世界》等雜誌給我看。可是記憶中，一直到了五年級為止，父母沒有給我買過單行本的書籍。也就是說，50錢以內的雜誌才好像勉強強強買給我看，我的家裏沒

有寬裕的經濟去購買一元以上的書籍。

有一次，我在學校聽老師講《一太郎的故事》這本書。老師說能買的不妨買一本看看，我還記得自己欺騙母親說是要買別的甚麼，用母親給我的錢買了這本書，可是那時候母親從錢包裏掏錢的苦澀的表情，我至今無法忘卻。

儘管這樣的事情對於窮人來說也許不足掛齒，但因為父親只是形式上的敕封軍官，家庭不得不一邊維護着中等階級的臉面和榮譽，而另一面慢慢持續着貧窮生活，這成為限制我成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記得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因家裏的拮据窘迫，父母激烈的爭吵給我留下了無比痛苦的記憶。在大學和專門學校讀書的哥哥們因為經常不在父母的身邊，我想他們不會知道父母在家中的爭吵，可是因為我自幼待在父母身邊的機會多，我是一邊目睹父母持家的艱辛一邊長大的。

我從幼年始對於金錢從沒認真考慮過，但是也從未因貧窮產生過自卑感，相反地對貧窮反而懷有一種自豪感。

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為了清理家裏存放的麥子，有一段長時間吃摻雜有麥粒的米飯。我故意對有錢人的孩子說，因為家裏窮而帶麥子盒飯，那位朋友像是信以為真。在孩子的心靈中真的有以貧窮而自豪的心情嗎？

### ☞ 家庭條件與我的成長 ☞

不消說，我家的經濟狀況離真正的貧窮尚有一段距離，父親又不是勞動者，故此也不會自認是無產階級的一員。在小學五、六年級的同學中，有一位H君是本市某電車售票員的兒子，後來想想



看，他可能是受其父親的影響，曾有對階級意識覺醒的言行舉動。

就我而言，因沒有類似情況，最終也不過停留於小市民意識階段。但在我以後的人生中，能擺脫任何特權意識，生活到今天，我想仍然是源於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正是那樣的家庭條件沒有使我產生納袴子弟的思想意識。正因為如此，即使現在我還在冥冥之中感激幼年時代清貧的家庭生活。

這點關於個人意識的形成，一個重大的要素，各人的家庭狀況有重視的必要。在我致力於思想史研究後，才開始悟出它的真諦。

和我幾乎是同時代的友人、歷史學家F教授，是信州（今長野縣）醫生世家出身。據我所知，他跟我這樣靠撫恤金維持生活的孩子，所受到客觀經濟條件影響是截然相反的。

就我的家庭而言，景氣的時代正是生活最為窘迫的時代，反而此後的昭和初年（1925年以後）經濟蕭條的時代，卻是生活相對寬裕的時期。原因之一是與我相差好幾歲的哥哥姐姐們都各自獨立，靠父母養活的僅剩下我。雖然我的家庭狀況特殊，但蕭條時代物價跌落，撫恤金卻固定不變，以撫恤金為生的人相對地能多少寬裕一些。昭和初年的經濟蕭條沒有給我留下任何記憶，後來從事歷史研究後，得知那時在農村發生過賣兒賣女一類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個人一點也沒有體會到蕭條時代的艱苦。這說明客觀社會並非直接地制約個人的生活，而是以家庭的特殊性為媒介，才作用於人的體驗的。

剛才提到出生在信州的F教授曾告訴我，當時家裏中斷了供應他上學的匯款，一個人在東京求學飽經滄桑。從此也不難看出社會局勢的變化與其個人的體驗，根據家庭境況的不同是有顯著差別的。